

佛教典籍展品综述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组 刘波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办公室 林世田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广泛传播到全国各地。自传入中国以来，佛教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多个具有民族特点的宗派，寺院经济高度发展。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兴盛，译经事业蓬勃发展。自汉至宋的千余年间，共译出经、律、论五千七百卷。此外，中国僧人与佛教学者撰著了大量阐述佛理、注释佛典的著作，通俗讲经活动和礼忏也形成了大量的文献。从宫廷到民间，抄经、刻经活动长盛不衰，虔诚的信徒甚至刺血抄经。雕版印刷术发展初期，其印刷品多为佛经。北宋之后，历代都有官版或私刻的汉文《大藏经》，单科佛经更是难以数计。佛教典籍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古代书籍的装帧演变和印刷术、版画艺术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入选第二批《名录》的宋元明清佛教典籍有 172 种，本次展览展出 21 种，展品品类丰富，特色鲜明，是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

写本藏经

大藏经按语系划分，有三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三大系统。若从功能划分，则有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形态。汉文大藏经是以历代汉译佛典为核心，按照一定的结构加以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佛教典籍丛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千余年间，各个时代均有汉文大藏经编纂，其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

在写本时代，包括佛经在内的中国书籍主要以纸质写本的形式流传于世。有财力的大寺院往往有自己的大藏。文献中屡有关于修造写本藏经的记载，敦煌写经中也出土了若干大藏经的零种，其中甚至有隋独孤皇后施造者。北宋开宝四年（971）《开宝藏》开雕，佛教大藏经开始了从写本向刻本的转变，但写本藏经仍然盛行，北宋浙中一带的金粟寺、法喜寺、精严寺、隆平寺、崇明寺、普照寺、兴国寺等都有写本藏经。

本次展览展出了北宋写本大藏经零种三种：

其一为北宋熙宁元年（1068）写本《解脱道论》十二卷，为《金粟山大藏经》零本。金粟寺在浙江省海盐县西南金粟山下，由西域僧人康僧会创建于吴赤乌年间，是江南最早的佛寺之一。明《续澈水志》记载，金粟寺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万余卷，卷卷相同，殆为一手所书”。

金粟山大藏经为宋代写经之翘楚，明代即传世珍稀，成为士大夫赏玩之物，清代多流归清宫。此藏以纸张优良，文字肥厚，墨色如漆，以及纸背的“金粟山藏经纸”朱印闻名于世。金粟山藏经纸约造于北宋熙宁至元丰年间（1068-1085），原料主要为桑皮，纸质厚重坚韧，经染黄、涂蜡、打纸，表面莹润，隐约呈现虎皮斑纹。纸背钤“金粟山藏经纸”椭圆朱印。

本件卷首题“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卷尾有题记4行：“维皇宋熙宁元年龙集戊申二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起首写造。僧道隆书，/校勘僧守仙，/勾当写大藏经僧惠明，/都劝缘住持传法沙门知礼。”本件曾经托裱，天头地脚似被裁割。

其二为北宋治平元年（1064）海惠院转轮大藏本《法苑珠林》。据其卷首所题“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知此藏为北宋皇帝赐给海惠院的转轮大藏。据其卷尾题记，知本卷在北宋英宗刚即位的治平元年由苏州张亢所书。一般来讲，抄写一部大藏需花费数年之功，则此藏很有可能为宋仁宗赵祯所赐。宋陈舜俞《海惠院经藏记》载，该院曾“募人书所传之经，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百十有八”，可能是这部转轮大藏之外的另外一部大藏。

转轮大藏经从功能上讲属于信仰型。转轮大藏简称轮藏，是将佛经装置在转轮上，用手推动即可运转。佛教信众认为，转轮每转动一匝，有如将一部大藏诵读一遍。这种方式，比诵读要简便得多，而功德却是一样的。轮经藏起源于南朝萧梁时的傅翕，经过唐代发展，至宋代已经十分普遍，主要分布在经济富庶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等地。宋代除了佛教寺院设有转轮藏外，道观也模仿佛教设置转轮道藏。

其三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句容县崇明寺写本《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此论为阿毗达磨六足论之一，简称品类足论，全书十八卷。印度世友造，唐玄奘译。因五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法虽众多而流类不同，此论随品类条贯义理，收摄一切法。

卷首题下钤有“句容经藏禅寺斗书毘卢法宝”朱文长方木印。折尾后有题记7行：“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陆云松书，/扬州僧子修校证，/徒弟僧法隆、法兴、景初、守象；/勾当写造僧守明，/阁主僧永真，/都劝缘兴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清济，/当县崇德乡卢江村崇德里奉佛弟子凌守宗谨舍。”

上述三件展品均为北宋时期写本藏经的零种，卷首均有千字文号，纸墨俱佳，书法端庄厚重，是研究写本大藏经与中国书籍史的重要史料。海惠院转轮大藏本《法苑珠林》与崇明寺写本《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曾经改装，均由卷轴装改装成经折装。

刻本藏经

从宋代至今，我国共出版木刻或排印本大藏经二十余种。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抄写、刻印或排印汉文大藏经。

本次展出刻本大藏经零种三种：宋《碛砂藏》、《赵城金藏》、明清《嘉兴藏》。

《碛砂藏》是南宋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陈湖碛砂延圣院刊雕的大藏经。约开雕于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端平元年（1234）编定并刻出目录。宝祐六年（1258）以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经中断三十年。元大德元年（1297），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继续雕刻，至治二年（1322）竣工。全藏经折装，共591函，1532部，约6362卷。每版5半叶，半叶6行，行17字。今存《碛砂藏》五部，各部之间又有所差异。《碛砂藏》继承了北宋以来南方系统大藏的特点，并成为明代藏经的祖本，保留了许多宋、元、明时期的佛教史料和珍贵版本资料。碛砂藏传世本多为杨家经坊印本。此次展出的碛砂藏零本为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明永乐年间杭州众安桥北朱家经坊印本，较为稀见。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雕版的佛教大藏经。因刻于金代，故称《金藏》，又因原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又称《赵城金藏》。雕版年代见于经卷中题记者有 30 余处，最早者为金熙宗完颜亶皇统九年（1149），最迟者为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1173）。发起募刻人为崔法珍，刻藏地点在解州（今山西解县）静林山天宁寺。全藏为卷轴装，以千字文编排次第，自“天”字号至“几”字号，计 682 帙，每帙 10 卷左右，总计近七千卷。20 世纪 30 年代初发现时已有缺佚，存 4957 卷，其后又有散佚，今国家图书馆存 4813 卷。大部分版式为每版 23 行，行 14 字，上下单栏，与北宋开宝时所刻《开宝藏》行款、版式全同，又皆为卷轴装，部分经卷中尚有开宝、咸平、天圣、绍圣等年代雕造、刷印的题记，可知其系以《开宝藏》为底本刊刻。其中有 40 余卷每版 23-32 行，行 20-29 字不等，字体、版式与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的辽刻《契丹藏》相一致，可能即据《契丹藏》覆刻。《赵城金藏》可反映《开宝藏》原貌及《契丹藏》基本面貌，为佛学研究、佛经校勘及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即以《赵城金藏》为底本，使其得以重放异彩。在 1942 年太岳军区组织力量抢救《赵城金藏》之前，此藏即已有部分经卷流散于世。抗战前后，北平图书馆曾购得 192 卷，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书家也有购藏。本次展出的上海图书馆所藏《赵城金藏》零本《景德传灯录》即为其早期流散品。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刻于明末清初，是大藏经诸种版本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发起于明嘉靖末隆庆初，万历十七年（1589）在山西五台山开雕，清康熙十六年（1677）完工，由浙江嘉兴楞严寺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个部分，总计 347 函，共收佛典 2141 部，12600 余卷。续藏和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此前藏经未曾收录的文献，包括疏释、忏仪、语录等。装帧为线装，故又名“方册藏”。

分藏异地的珍贵佛经

有两种文献割裂、分藏异地的珍贵佛经，在本次展览中破镜重圆，合璧展出。

其一为北宋元丰七年（1084）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首尾存山西省图书馆，中间部分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此经二十一纸，每纸 25 行，行 16 字。每版左侧末尾小字刻“合论四十一”字样及版次顺序号。文中“敬”字缺末笔，“恒”字不讳。卷末有元丰年问题记。山西省图书馆存第一至五板、第二十一板，第六板存前半部（至“欲令从生离诸相着示现一切世间”终），第二十板存后半部分（自“待大悲万行长故养虽长养”起）。首纸长 48cm，尾纸长 52cm。第六板后半部至第二十板前半部分由内蒙古图书馆收藏。

此经曾经改装。现为经折装，但它的版面行距相同，没有经折装半页间较大的夹缝，有些字的较长的笔画甚至折到了另一半叶上；版次顺序号在版框左侧外，而不像一般的经折装把版次顺序号刻在半页之间的夹缝处。由此可知，此经原为卷轴装，现在的经折装是后来改装的形式。

其二为大理国保安八年（1052）写本《护国司南钞》，其首尾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间部分藏云南省图书馆。

《护国司南钞》系以《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底本，对隋唐时期流传于内地的名僧良贲的《仁王经疏》所作的注解和校勘。卷端有“内供奉僧崇圣寺主义学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的题款，卷末有“保

安八年佛弟子比丘释道常奉举七代先亡写疏一卷”手记，为大理国时期写经。此经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在音韵学、佛典校勘、佛经版本学等方面均具较高学术价值。此件为1956年费孝通等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凤仪北汤天法藏寺发现的古本佛经之一。

据法藏寺所存明永乐十九年（1421）董贤撰写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记载，明洪武年间，傅友德、蓝玉、沐英进入大理地区之后，当时各地寺庙中所藏的经书几乎烧毁殆尽。阿吒力教名师董贤搜集幸存下来的一些经书，并到外地搜寻，汇集了五千余卷，“将来本郡，合为一藏”，可功德与敦煌之道真和尚相埒。1956年法藏寺发现的藏经，就是董贤收藏的经卷。

金银字写经

以金银粉调汁缮写的佛教典籍，称为金银字写经。金银字写经出现于梁大通年间（529-534），因其贵重，常作为供养经。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大规模的金银字写经已很少见。本次展览展出了两件金银字写经。

其一为北宋开宝六年（973）金银字写本《妙法莲华经》。此经卷首为金粉绘经变画，后有开宝六年题记三行：“信佛弟子杜遇特发志诚，敬写金银字妙法莲华经一十部，/奉为四恩三有，普及一切有情，自他同得福德，智惠二种，/庄严读诵，见闻俱登佛果。时开宝六年癸酉六月十二题。”卷中经名、译者用金粉写，正文用银粉写，正文中凡“佛”字亦用金粉写。装帧、书写均豪华精美。

本件为董诰、康有为旧藏。首题下钤有“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行六十万里”朱文菱形印。尾题下有朱书“董诰”二字，次行下钤有“万木草堂”朱文方印。

其二为泸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写本《妙法莲华经》，此经为陈文华以泥金在磁青纸上写就。卷首为仇英金绘经变人物图，董其昌题识。早年已遗失第四卷一半及第七卷，现存五卷共639页。其中仇英画佛和董其昌题识16页，初为镇江丹徒北固山甘露寺藏经阁收藏的泥金写经之一。清军入关后，豫亲王多铎率军袭踞北固，得到此经。嘉庆年间，邻水廖某任两淮都将，在豫亲王府得此写经，子孙相传。

郑和刻经

本次展览展出了一件明三宝太监郑和所刻的《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为世不多见的珍罕印本，弥足珍贵。

摩利支是位女性菩萨。摩利支意译为“光”。摩利支天行于日月之前，能隐身，以隐身法救人苦难，民间常供养其神像，以求福佑。佛教信众认为《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具有护身、隐身、得财、诤论胜利等功德，能为人消除障碍，增进利益。诵《摩利支天经》，还能“行路难中护我”，“远离诸难”。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隆佑太后往南方道场求护身法，由于路程遥远，即有人奉劝“奉摩利支天母”，可求得路途平安。

此经共有三个译本，分别为唐菩提流支、唐不空及宋天息灾所译。宋仁宗曾为天息灾译本“亲制圣教序以冠其首”，开启了摩利支天菩萨信仰流传中原的契机。唐不空译本流通较广，是摩利支天菩萨信仰的重要经典依据。《大正藏》则收录菩提流支译本，归入密教经典类。

此经尾有道衍跋，其中称：“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这是确定刊刻者的依据。道衍（1335—1418）是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俗名姚广孝。郑和（1371—1433）是明代著名航海家。名家刻经，弥足珍贵。

此经版画精美，曾经版画收藏大家郑振铎收藏。

南明刻本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一些地区性政权，统称南明。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十八年。永历政权是南明最后的余绪。

南明永历小朝廷存在时间短，又始终处于清军攻击的强大压力之下，版刻活动少，传世印本稀见。本次展出三件南明刻本，分别是永历六年（1652）李定国刻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永历六年（1652）刻本《慈悲水忏法》三卷、永历九年（1655）孙可望朱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叙述佛在祇树给孤独园，比丘莎底为黑蛇所螫，痛苦不堪。阿难向佛求救，佛为其说大孔雀明王神咒救之。此经前后有多个译本，通行本为唐不空译本。

《慈悲水忏法》为唐代僧人知玄著，三卷。“慈悲水忏”亦名“慈悲三昧水忏”、“慈悲道场水忏”、“三昧水忏”等，简称“水忏”。佛教认为，要消除以往所造罪过，才能修行成佛。忏法就是悔过消罪、积极修行的一种佛教仪式。中国佛教的忏法起源于晋代，初盛于南朝，大盛于唐代。现在通行的有《梁皇忏》、《慈悲三昧水忏》、《观音忏》、《大悲忏》、《药师忏》、《净土忏》、《地藏忏》等，《慈悲水忏》是诸多忏法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孙可望永历九年（1655）印本为朱印本，以浮签标出三十二分，很直观地表现了朱印本的功用。朱印本与蓝印本性质相似，都是刻版完成后最初的印本。明清刻书，书版刊刻竣工之后，一般用红色或蓝色先印若干部，经校对改正无误，然后墨印。朱印本、蓝印本都是初印，字迹清晰，点画完整，印本有时还留有墨钉和校改字样，为藏书家和读书人所珍视。

结语

本次展出的佛教文献品类丰富，既有写本大藏经零种、刻本大藏经零种，也有单刻、单写的佛教经论。精美豪华的金银字写绘本与浮签朱印本等非常引人注目。南明刻本、大理抄本、郑和刻本、塔经等都是稀见的文献。分藏异地的佛经合璧展出，更可谓书林佳话。它们当中不仅有重要的佛教文献，也有值得珍视的版刻史料，堪称佛教文献精品的集萃，也是整个展览的亮点之一。